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五辑·第十二卷)

[现] 雷沛鸿
(1888年~1968年)

基础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 - 80135 - 741 - 8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30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
[现] 雷沛鸿基础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41 - 8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五辑·第十二卷

[现] 雷沛鸿基础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上 篇

雷沛鸿民众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民众教育思潮的确立及演进	(1)
(一)“民众教育”的提出	(1)
(二)民众教育思潮的形成和确立	(2)
(三)民众教育运动的扩展	(3)
(四)民众教育的政治化及其衰落	(4)
平民教育的性质与地位	(5)
平民教育的宗旨与使命	(8)
平民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11)
(一)社会调查	(11)
(二)四大教育	(12)
(三)三大方式	(14)
民众教育思潮诸流派及其主张	(15)
(一)官方的民众教育主张	(15)
(二)江苏教育学院的民众教育主张	(18)
(三)平民教育派的民众教育观	(22)
(四)乡村建设派的民众教育观	(24)
(五)其他人士的民众教育观	(26)
雷沛鸿的普及教育思想	(29)

(一) 国民基础教育的涵义及实施方案	(30)
(二) 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途径和要素	(32)
(三) 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经费筹措	(36)

下 篇

雷沛鸿教育文论选读

工读主义与普及教育	(41)
提议人雷沛鸿	(45)
中国教育的新要求	(48)
民众教育的自觉运动	(52)
现代中国教育的两宗疑案(上)	(54)
现代中国教育的两宗疑案(下)	(60)
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概念	(64)
妇女运动、社会运动与教育运动	(68)
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下的互教与共学问题	(72)
整个教育体系的演进	(74)
前学龄教育与国民基础教育	(78)
国民基础教育的特性	(81)
(一) 继续性	(82)
(二) 前进性	(82)
(三) 变异性	(84)
(四) 常动性	(84)
(五) 创造性	(86)
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下的教育历程	(87)
民族战争与民族教育(节录)	(92)

国民基础教育的产生	(96)
(一) 哲理根据	(97)
(二) 社会基础	(99)
办理国民基础教育的三个要素	(100)
(一) 引论	(100)
(二) 经济要素	(103)
(三) 组织办法	(105)
(四) 人才培养	(106)
(五) 结 论	(108)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流问题	(109)
(一) 引言	(109)
(二) 两类教育之区别讨论	(111)
(三) 各种调和办法	(113)
(四) 合流的主张	(113)
国民中学制度之当前重要问题——从行政学理研究试 探与解决国民中学制度之当前重要问题	(116)
(一) 介绍题目	(116)
(二) 讨论范围	(117)
(三) 国民中学因何故而建立	(119)
(四) 什么是国民中学的性质	(120)
(五) 怎样改造及健全国民中学制度	(125)
(六) 展望	(134)
国民中学与学制改革	(134)
(一) 学制改革综观	(134)
(二) 国民中学的创制及其悬案的解答	(135)
(三) 国民中学的新姿态	(137)
(四) 国民中学对于学制改革的贡献	(142)
(五) 结论与建议	(149)

国民中学教育之目的理想及措施——从教育学理研究、试探与解决国民中学教育之目的理想及措施问题	(151)
(一) 本篇研究题目	(151)
(二) 为什么国民中学有如许繁多复杂问题	(153)
(三) 谁是国民中学的施教对象	(160)
(四) 什么是国民中学的施教方针	(163)
(五) 怎样向导国民中学的教育发展	(168)
(六) 什么是国民中学的教育职责	(171)
(七) 什么是国民中学的教育使命	(174)
(八) 什么是国民中学的教育内容	(180)
(九) 什么是国民中学的教育方法	(181)
(十) 如何解决师资问题	(183)
(十一) 一个远景的透视	(183)
“实事求是”的再估价	(184)
科学发明的社会条件	(186)
发扬理性的批判精神	(188)
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特性	(190)
(一) 什么不能构成大学的“大”	(190)
(二) 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	(194)
西江学院的世界文化基础——西江学院创设史的一章	(202)
(甲) 绪论	(202)
(乙) 本论	(203)
(丙) 结论	(210)

上 篇

雷沛鸿民众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民众教育思潮是勃兴于民国后期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全体民众作为教育对象,旨在使未受教育者享受基础教育,受过教育者享受继续教育;并且还兼有政治宣传和促进地方自治的功能,力图造就与时俱进、符合现代公民要求和具备基本素质的国民。

民众教育思潮的确立及演进

民众教育思想的渊源由来久矣。周公的“彝教”、孔子的“齐之以礼”、《学记》的“化民成俗”等观念,以及宋代的“乡约”、元代的社学,这种古老的“教化”传统与民众教育在形式上有着某种脉承关系。但从科学内涵上来讲,民众教育思潮的形成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以及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思想的传播,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一)“民众教育”的提出

在孙中山早期的言论中,多次使用了“民众”一词。1921年,沈雁冰、欧阳予倩等人创立“民众戏剧社”,该团体具有民众教育的意味。1924年1月初,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草稿中,多次使用了“工农”二字。汪精卫在审改时,或删去“工农”,或代之以“民众”。这件事,典型地反映了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人的深刻矛盾。这正是工农教育与民众教育的根本歧异所在。

参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

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在由汪精卫代拟的遗嘱中,写有“必须唤起民众”一句。此遗嘱经孙中山签名认可,广布于世,“民众”一词于是不胫而走。

“民众教育”作为专门术语,似最早见于韦惠的言论;而它的法定化、正规化使用,无疑自许崇清始。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许崇清出任委员兼广东省教育厅长。在他拟定的《教育方针草案》中,第6项纲领为“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此后,民众教育不仅屡见于报章,而且被广泛接受。

(二) 民众教育思潮的形成和确立

广而言之,北伐战争时期运用多种形式对民众进行的宣传鼓动,均属民众教育的范畴。严格地说,民众教育作为一种思潮,它应有特定的理论指导和较多的代表人物。因此,它的形成标志,当推江苏民众教育学校。

1928年初,江省省教育厅扩充教育处处长俞庆棠,邀集晏阳初、汤茂如等人在苏州讨论民众教育问题。3月,筹创民众教育学校,由俞庆棠兼任校长。该校以培养民众教育师资为职志,致力于以教育的力量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后更名为“民众教育学院”,由赵叔愚接任校长;赵叔愚病逝后,由高阳接任。1930年,该院与“劳农学院”合并,定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该院出版《教育与民众》月刊,这是专门研讨民众教育理论的园地。该院还附设有民众教育实验区、民众学校多处,通过实验来检测理论。该院先后聘任的教育专家有:傅葆琛、李蒸、雷沛鸿、董渭川、甘豫源、孟宪承、徐旭、陈大白、许公鉴、赵冕、陈礼江、徐锡龄等人。真可谓群星璀璨,人才济济。他们纷纷围绕民众教育问题著书立说,合而构成重要的理论派别。因此,民众教育思潮的形成,自当以该校的创办作为物化的标志。

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于南京召开。会上议决通过了《实施民众教育及确定社会教育案》,将民众教育列为配合“训政”的重要措施。民众教育自此正式确立。

(三) 民众教育运动的扩展

理论往往要通过实践来展现。在民众教育思潮的指导下,政府与民间合力发起了民众教育运动。

1928年6月,江苏省政府率先组织“民众教育设计委员会”;其后,改南京通俗教育馆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同年10月,教育部拟订《民众识字施行法》。

1931年1月,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民众学校为实施民众教育之一种重要措施”,要求各地推广。同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审议了《改进全国教育方案》,要求“尽量推进”成人补习教育。同年12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无锡成立,该社是重点研讨民众教育的学术团体。据1931年统计,各种民众教育实验机构已达130余处。

1932年1月,教育部颁发《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该馆为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从此,民众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同年7月,教育部修正公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规定16—50岁之男女失学者,均应入民众学校,并采取先“劝导”,后“强迫”的方法。1933年3月,教育部增设“民众教育委员会”,颁发《县市民众教育委员会组织要点》和《宽筹社会教育经费》等条例。其后陆续出台的民众教育法规还有:《民众学校规程》、《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普及成年民众教育实施办法》等。这些制度法规,不仅表示了民众教育已走上正轨;而且还是民众教育思潮深化的表征。

(四) 民众教育的政治化及其衰落

从民众教育思潮的兴起来看,它虽反对工农教育中的阶级意识,但其政治色彩并未消退。当它被政府所借重,并被纳入正轨之后,其政治性日益浓烈。

其典型表现有二:

(1)“特种教育”的实施。1933年3月,国民党中央颁发《特种区域暂行社会教育实施办法》,决定专设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以“中山民众学校”为实施机关,对“被赤化的成人和儿童”施以“教养卫兼施”的教育。这种特殊的民众教育,是以反共为基调的。

(2)“新生活运动”的推行。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旨在灌输“四维八德”,恢复固有文化,其实质是为巩固专制和独裁服务。这既影响了民众教育的内容方法,又可视其为社会化的民众教育运动。

或许因为民众教育的官方色彩过于浓重,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国难教育”、“非常时期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口号日益响亮。“西安事变”后,国共决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民众教育显然已不能包容抗日救亡的时代内容。加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更多地使用大众教育术语,民众教育已显得过时。“七七事变”后,“战时教育”更是跃居主流地位。虽有“战时民众教育”一说,但已退为支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迁校后被裁撤,便很能说明问题;民众教育理论家之一的陈礼江,在四川创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也较少沿用民众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众教育一词虽未消亡,有关的组织机构、规章条例也未明令废止。但是,其平享教育权的进步内涵,已为大众教育思潮所消溶;其救亡图存的中心任务,已被战时教育思潮所接替;

而普及教育的根本主旨,又被国民教育思潮所取代。民众教育思潮渐次平复。

平民教育的性质与地位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独创的一种教育体系,它与近代中外教育史上所称平民教育概念迥然不同。它不是以慈善为怀的施米施粥的贫民教育;不是为少数人专有的“阶级教育”;不是欧美式的成人补习教育;也不是社会教育的别称。平民教育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的,为全民而有的一种新兴教育。它既不仿古,也不仿欧,而是一种空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运动与教育革命。

晏阳初回顾了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历史,指出:“现在的‘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的拿来借用。”他认为“充分模仿外国,结果导致了整个教育的破产。学习外国是必要的,但不能东拼西凑,而应当有独立性、选择性,要把中西的学问融化在一起,应用到人民生活中去。”办教育要根据问题定方针,不能不问病源乱吃药。中国的教育家要自尊自信,要有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路。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病源在哪里?“五四”运动时期,晏阳初在

晏阳初:《“误教”与“无教”》,《民间》第三卷第13期。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史(初稿)》。

法国举办华工识字教育时,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对华工的轻侮与蹂躏,痛感到“苦力”的“苦”,同时也认识到“苦力”的“力”。回国后,看到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不受教育不知社会情形;社会腐败,而多数贫苦人民只能淡漠旁观。

他认为中国正患着瞎、聋、哑的病。救治这种病症的办法就是“多在平民教育做工夫”,“万灵丹就是在读书识字”,指出“这个责任完全在教育界”。他期望五年之内能在全中国普及识字教育,否则国家将会主权“旁落”。他说,“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国,支配前途,改造社会。”正是这种“教育救国论”的信念,使晏阳初毅然放弃了专心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决心不升官发财,不上政治舞台而投身于平民教育,并把它作为自己矢志追求并献身的事业。他说平民教育的“平”字,含有“人格平等”、“教育机会平等”的意思。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良,剥夺了多数人受教育的机会,使得人们本来平等的人格显出了高低上下之分。他相信“在社会组织未经改良之前,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藏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样,人格不平等的原因就可以消除了。”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民众的“脑矿”未开,平民教育就是开脑矿最简单最适用的工具,它是为在国家教育系统上不占位置的二万万以上的青年与成人文盲创造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是“民主国家里最重要、最正宗的教育事业”,“在中国现状之下,比较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义务教育还更重要。”

1924年以前,晏阳初与平教总会的工作重点是城市平民、士兵、妇女的识字教育。后来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

晏阳初:《平民教育》,《新教育》第七卷第23期。

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平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不顾及农民的平民教育算不上是整个的平民教育。为此,平民教育运动由城市为重点转向以农村为重点。以后又经过1924年至1929年在保定地区、京兆、清河、获鹿以及定县翟城村的试验与社会调查,晏阳初对中国社会问题与平民教育的性质、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教总会遂迁往定县,开始了定县实验的一个新时期。至此,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完成了由识字运动到农村建设的战略转移。关于这一战略性的转移,晏阳初是这样认识的: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与封建传统的压迫,中国整个的国家日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乡村的破产与广大农民的衰老、钝滞、麻木和种种退化现象,就使社会面临着一个“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所以结果也就逼上了乡村建设的一条路。在这种情况下,平民教育如果还仅仅停留在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上,而不去提高他们的觉悟,不激发他们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的信心,不给予他们使用工具的机会,那么平民教育对于农民与农村是毫无意义的。

乡村建设是平民教育的一个新阶段。它要求将改造人与改造环境结合起来。在这里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各种改造、建设的成功,都需经过一个教育的过程;教育成功了,一切改造与建设才有希望。通过教育手段,达到建设的目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晏阳初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断无疑是不科学的;他过高地估价了教育的作用,认为在社会不良制度未改变之前,教育能够单独负起支配国家前途,改造社会的责任,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这种观点也反映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一种社会理想。他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

晏阳初:《十年来的乡村建设》,《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性,无私地献身于规模空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倡导知识分子走出象牙之塔,回到民间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做法,也是对中国封建性旧教育的一种革命。

平民教育的宗旨与使命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时,宣布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其根本宗旨。晏阳初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内受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同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谋。”他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世界是民族智识的战场。中国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三万万以上是文盲,这些同胞名为共和国的主人,实际上如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以我们这样目不识丁的民族与那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自然是瞎子斗不过明眼人。为了使民族能生存于当今智识竞争的世界,并对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贡献,只有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尽心竭力于平民教育为天职。“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齐家治国治天下平。”平教运动的宗旨体现了晏阳初从根本上改造人的主体思想。早在欧洲战场上,他就发誓毕生为劳苦大众服务,要为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而献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直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使命》,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资料。

《平教同志歌》,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档案资料。

是主宰他从事平民教育的根本信条。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在这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必须从四万万同胞身上着手。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垫高民族的基础,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必须唤醒民众”的遗愿。

因此,他认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

“除文盲”是整个平民教育的基础工作,它以人人识字,人人取得基本教育为目标;“作新民”则是平民教育的高目标,目的在培养适应二十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公德心及健康体魄的“完整的人”。晏阳初的这种“新民”理论(包括培养“完整的人”),是建立在抽象的“人”的概念上的。

当平民教育转入乡村建设新阶段之后,晏阳初强调指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也即农村运动)的使命是“它耸着巨大的铁肩,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他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他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他的新团结新组织。”为什么“民族再造”的使命要靠“乡村建设运动”来担负呢?这是因为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民族的优点与美德要比都市人保留得多一些。

因此,乡村运动责无旁贷要承担起“民族再造”的使命。三万万农民当中,希望之所寄在八千万左右的农村青年。他们是继往的好手,也是开来的良工。他们可以做救护中国的生力军,改造中国的挺进队。

为了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就要依靠教育来完成。什么样的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版。